

# 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国的分布及动因

陈列

纵观当今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先辈，大多是在两次“鸦战”之后，沦为“猪仔”华工，被西方列强贩往南洋和世界各地的。在1840—1860年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间）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猪仔”贩运大大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

鸦战后，厦门和汕头先后成为早期贩卖“猪仔”的中心和据点。据史料所载，1843年11月1日厦门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1853年，由此出国华工已达12261人<sup>①</sup>，其中，以去古巴的最多，有5205人，其次为澳洲，有3585人，去西印度群岛的有1577人，去秘鲁的904人，去美国410人，留尼旺岛380人，夏威夷300人。又据记载，1852—1858年，从妈屿岛和南澳岛运出的“猪仔”，约为40000人。1852年英国从这里贩运一千名苦力往圭亚民地麦拉；同年12月，厦门爆发反对贩卖“猪仔”的斗争后，西方侵略者把走私鸦片贸易和贩卖“猪仔”转移到粤东这一重要据点。外夷早就据南澳“以此为巢穴，时出肆掠居民”。1855年就有美、英、秘鲁和智利12艘船共12775吨贩运苦力6388名前往拉丁美洲各地<sup>②</sup>。是年同时还有西班牙船贝拉·加拉加号装运苦力400人前往古巴<sup>③</sup>。1856年一艘丹麦船在距汕头市七公里的妈屿岛，以雇用工人运鱼为名，诱拐30名苦力并强装出洋，连家中妻儿老小皆不明其下落<sup>④</sup>。据不完全估计，在上述同期妈屿“猪仔”草棚内被折磨至死者竟达8000人，占运出“猪仔”总数的五分之一。

自1841年1月，香港被英国占据并宣布为自由港后，就设有与槟榔屿、新加坡相联系的招工机构，贩运“猪仔”华工往南洋群岛及世界各地。1848年美国金矿的发现和1851年澳洲金矿的开采，使香港很快成为贩卖契约华工的重要基地。1852年，往旧金山的中国人即达3万人，仅船票钱一项就使香港有150万银元的收入<sup>⑤</sup>。

由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能给外国带来极大的利润，外国公司纷纷前来抢购“苦力”，出现船只供不应求的现象。1854年香港《中国邮报》报道，由于招

诱华工出国人多船少，甚至被弃置多年的欧洲破船，都高价抢购装运。当时，一艘850吨破船卖价竟高达85000银元。香港发生过几起船舶事件，又有美船林格利德号，瓦伊金号和英船福泰特号等分别在台湾及日本附近沉没，华工全被淹死。1856年还发生两起苦力船上华工大量死亡的案件：1856年3月13日从香港开往古巴的约翰加尔文号，船上293个苦力在航行中死亡135人；1856年4月2日从香港开往古巴的波特兰公爵号，船上载有332个苦力，在航行中死亡128人。仅这两起案件死亡率分别达45%和39%。同时，经过“调查暴露了船上有许多苦力是遭到绑架的”，“香港政府因此受到谴责。<sup>⑥</sup>”

鸦战后，随着香港兴起，澳门也于1845年11月20日宣布为自由港。1851年澳门已成为贩运“猪仔”往古巴和秘鲁等地的据地。容闳在1855年抵澳门时目睹“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sup>⑦</sup>

1844年7月，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据记载，1845年法国在厦门贩运契约华工出国时，“亦从福州直接招募华工”<sup>⑧</sup>到留尼旺岛去。仅在1855年，英商就在福州招诱1901名契约华工，由葡萄牙船艋舺船运往汕头，再由“等候在那里的卡塔利亚号”转运出洋<sup>⑨</sup>。早期在福州契约华工被拐诱后亦是关押在趸船上，待成数后运往厦门或汕头出国。据留尼旺岛福建会馆的记载，到该岛的福建人有三千余人，最后一批华工于1901年10月15日到达，有福安人顾鸿秀、张水禄等808人<sup>⑩</sup>。

在鸦战前，上海宝山县有吴阿小等人被人拐卖出洋；<sup>⑪</sup>鸦战后，1843年11月上海辟为五口通商口岸，贩卖人口之风更盛。1849年，随着美国西部开发的需要，在上海也招引华工出洋往美国去。据史载，哑吗三号船载200名契约华工从上海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1851年雷金娜号船载二、三十人往澳洲<sup>⑫</sup>。1856年11月，有苏州人张贵廷等七、八人被拐到吴淞口上船开往古巴。1857年有江苏人朱开自等73人被骗下船出洋<sup>⑬</sup>。同年12月，上海海关查获英商安德烈·康诺利租用美船犹太浪人号，装载236名苦

力欲从上海经厦门、汕头开往古巴。后经海关发现，236名苦力中，有117名是通过非法手段强迫上船的。他们被欺骗说：“只要到外国船上做几天工，就给他们三块钱。”有个美国人西蒙，在上海开设酒吧店、雇佣一批娼妓和舞女招揽顾客，暗下蒙汗药把人灌醉后，绑起装入麻袋，卖给人贩子，装船出洋。以后其他外国老板也群起仿效⑪。

1844年1月，宁波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西方殖民者亦从这里贩卖契约华工出国。1847年，有浙江人陈义、张福等一批人被骗往古巴当苦力。1855年2月，人口贩子（葡萄牙人）安东诺·马丁内兹通过宁波另一个人口贩子罗宾诺，在宁波、镇海和慈溪等地拐卖47个女孩，价格3—8银元不等。押入停泊镇海的英船英格伍德号，说是送往马尼拉雪茄烟厂去做工，实是拐卖入古巴为奴。这些中国女孩在从宁波往厦门途中。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连牲畜亦不如地挤在被钉死的密舱里，以致全部晕倒，并酿成瘟疫，蔓延全船。掳掠人口造成宁波社会的不宁，由于“被诱者多，风声传布，人多不平之”。1858年至1860年期间，正是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后期，西方人口贩子利用清朝内忧外乱之机，大肆掳掠中国苦力出洋。西方列强及其殖民当局的代理人利用掳掠苦力价格的供求关系，在贩卖和奴役“猪仔”华工中牟取高额利润，从而促使鸦战后华工出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后，西方列强把中国看作是“一块肥肉”，并“都想来争尝这块肥肉。”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列强以五口通商口岸为名，掠夺苦力华工的活动从澳门扩展到广州、香港、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汕头等地。但是，华工出国仍属清朝政府禁律。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强占广州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公然掳掠绑架华工贩卖出洋。1859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逼清朝签订《北京条约》；同时，中法签订北京《续增条约》。由此，迫使清朝放弃闭关禁海政策和以往限制中国人出洋禁令，从而首次给西方列强对华招诱苦力出洋以合法权利，并为各国前来掠夺契约华工大开方便之门。其后，又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使成批中国良民从此被毫无禁忌地诱贩出洋，以致到19世纪50—70年代形成苦力华工出国的历史高潮。

鸦片战争后华工的大量出国，是由许多因素所

造成的。就国内因素而言，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深和激化，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敲诈勒索，民不聊生，走头无路；西方列强入侵破坏中国几千年来自然经济秩序，鸦战赔款，白银外流，加上鸦片泛滥，百姓受害，流离失所，导致国弱民穷，沿海人民大量逃到南洋当苦力；此外，自然灾害恶性爆发。据统计，福建从1068—1911年的844年间，发生灾荒饥馑888次。其中，漳、泉、莆、仙等17个县发生321次，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饥荒。又如，广东台山县从1851—1908年的58年间，发生各种灾害共36次，平均一年半即有一次灾荒。在饥寒交迫，走头无路下，只好背井离乡、外走出洋，以谋生计。就国外因素而言，由于19世纪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生产力革新，开始形成世界市场；原来西方国家的商业垄断转向自由贸易，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商业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发展种植园和采矿业，以获取工业原料。虽然中国人被辱骂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可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工垂涎三尺。由于美国加州、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澳洲维多利亚和新西兰奥托沟金矿的发现，古巴和西印度甘蔗园经济作物的经营，秘鲁鸟粪和种植园的开发，北美洲几条横贯太平洋和大西洋铁路的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以及东南亚各地锡矿的开采和热带作物的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西方列强对东方殖民地的争夺更为疯狂。由于西方殖民者长期的入侵、掠夺和屠杀，致使当地土著民族锐减。例如，从16—19世纪长达四百多年中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据估计就有150多万人⑫。西班牙在三百多年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使印第安人灭绝2500万人。在西方殖民者来后几十年中，加勒比海各岛数百万印第安人全部被消灭。美国境内大约有100万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仅剩下25万人⑬。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由此产生的奴隶制危机，西欧各国先后废除奴隶制，易导致劳动力来源中断，各种种植园和矿山急需新的劳动力补充。而当地白人要求月薪高、待遇好、且不愿干重体力活。中工国劳（指苦力华工）则被认为最廉价、最优质的劳动力。这样，西方殖民者转向中国和亚洲汲取劳动力，以补充西方社会生产的需要。据估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⑭。

“猪仔”华工出国高潮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由于国内和国外两种动因所导致的；从内因与外因关系看，鉴于当时国情世情和历史诸多条

件，“苦力”华工出国散居世界各大洲，乃是外因居主导地位的。同时，这种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社科部讲师)

### 注释：

- ①《英国蓝皮书》1852—1853年，关于中国移民通讯，《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1853年3月25日。
- ②戴维斯·琼斯：《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美国与中国丛刊第一种，第十七卷，苦力贸易与中国移民。
- ③《英国蓝皮书》，1855年，第255页，第34号文件附件。
- ④上海《北华捷报》（英文），1858年3月3日。
- ⑤E.J.阿黛尔：《中国的欧罗巴——香港历史》，第259页。
- ⑥斯达柯特：《香港历史》，1974年第二版，第129—130页。

- ⑦容闳：《西学东渐记》。
- ⑧⑩何静之：《华侨志——留尼旺岛》，台北，1966年，第16、18页。
- ⑨《汕头侨史》，1985年第一期，第36页。
- ⑪光绪32年4月初8日，外务部档。
- ⑫《英国蓝皮书》，1852—1853年。
- ⑬《古巴华工口供册》。
- ⑭王明侠：《旅美华人悲欢曲》，第8页。
- ⑮艾周昌、陈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第142页。
- ⑯梁守德：《民族解放运动史》1985年，第37页。
- ⑰《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第3页。

（上接76页）

- 达，1987年，第1501页。
- ②《伊斯兰教历一世纪时伊斯兰教传入南洋群岛》，印尼《罗盘报》，1980年9月28日，第10版。
- ③李长博：《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60页。
- ④《印度尼西亚民族史》，雅加达，1977年版，第479页。
- ⑤⑧转引自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1946年，第6页、第13页。
- ⑥普里约胡托莫：《印度文化史》，第二册（Pri johutomo: Se, arah Kebudayan Indonesia II），1953年版，第91页。
- ⑦周致中：《异域志》上。
- ⑨⑩茫雅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瑞古劳》（Uangaradja Onggang Palinrdungan, “Tua-uaku Rao”），雅加达好望角出版社，1964年，第653页，第656、659页。
- ⑪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5页（文中提到的彭德庆和彭瑞和，应为祖孙关系。引者），第87页。
- ⑫哈林姆：《爪哇岛上伊斯兰教九贤》，马来西亚使者报，1980年11月9日。

- ⑬转引自阿孟·布第曼：《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穆斯林》，三宝垄，《沙迪亚·哇扎那》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 ⑭印尼《独立报》，1984年2月17日，第7版。
- ⑮《印尼大百科全书》，雅加达，1973年，第455—456页。
- ⑯穆罕默德·哈里·苏哇尔诺：《先知时代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印尼《独立报》，1984年3月23日第七版。
- ⑰陈育崧：《明代中国移民和东南亚回民的关系》，《南洋学报》，第30卷，第1、2期。
- ⑲⑳转引自阿孟·布第曼：《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穆斯林》，第36—37页。：第32页。
- ㉑甫榕·沙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第87页。
- ㉒特·赫拉夫和比赫奥特：《爪哇第一个穆斯林王国》，1974年，第38—47页。
- ㉓〔美〕G.W.史金纳：《爪哇的中国人》，中译本。《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27页。
- ㉔玛斯·阿贡（荷伟泰）：《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发展》，1988年。